

嬗变中的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关系嬗变

◇戚攻 [重庆行政学院 社会学部,重庆 400041]

摘要:当中国社会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空间时,两者的关联度迅速提高,并引起中国社会关系及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那就是:一种非国家层面的(国体与政体关系除外)、对中国社会所有累积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社会契约关系”正在形成。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社会关系;嬗变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89(2004)01-0094-05

一、嬗变中的全球化与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

“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正如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在《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中所说:“困难在于这个专业术语描述的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而现实“全球化的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1]。基于弗里德里希斯认知全球化的视角,那么,全球化作为一种状态,需要对其建立“量化”的指标体系;而作为一种“过程”,又需要对其动因、现象(影响)和行动主体做出描述性的评估与判断。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詹·罗西瑙的描述性判断是:“全球化指的是不受领土和司法限制,体现于个人和组织的日常行动与思维中的变化过程”;“本土化(localization)指的是迫使个人、团体以及制度缩小其活动空间,接受不一样的行动方式,回到不具包容性的过程”。他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表现为一种“裂合”关系,以及裂合不否定二者相互促进的必然性等等。

一般而言,量化指标对于“描述性的评估和判断”具有科学的支持作用。但是,当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外在的趋势展现时,某一特定阶段的量化指标作为衡量“趋势”的指标体系,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局限。正如人们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而资本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但从英国权威的

《经济学家》周刊,自1997年10月18日开始以编辑部的名义展开对全球化的系列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文章之一《衡量全球化》和文章之二《是否存在全球资本市场》通过量化分析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又认为:“尽管有各种各样夸张的说法,但全球资本市场至今仍不存在。”这是基于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性指数还低于20世纪初的判断,而且“按资料记载,1913年世界的出口率已达到12%,而二战后的1950是7%,经过1973年的12%,一直增长到1993年的17%。因此,今天的全球化与20世纪前期相比,纯粹数量上的差异远比观察家们估计的要小。”^[2]

由此,对于全球化的认知,本文拟作出描述性的评估和判断补充,即“全球化”因人类社会工业化而发生,是生产的社会化走向社会化生产而由此推动世界市场形成所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嬗变过程与全球性的综合社会效应。在人类“工业革命”前的种种对外扩张,如公元前的古罗马、奥匈帝国和1207年后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等,并非具有全球化的意义与特征;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1492年发现美洲,1605年发现大洋洲的对外扩张,也只能视为全球化的初始,或者说只是带有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某些特征。

笔者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与交叉整合而发生的全球性社会效应,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全球化。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外部,引发了超国家权力与人权和国家主权之间关系结构的变化和国际关系边界的重新界定;在

* 收稿日期:2003-09-15

作者简介:戚攻(1957-),男,黑龙江佳木斯人,社会学教授,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学部副主任,重庆市人口研究所执行副所长,主要从事发展理论、人口与移民、网络社会学的研究。

内部,引发了集中于国家和政党的权力部分地重新分配和回归于不同社会主体。^[3]全球化作为一种逻辑关系语境,意味着必须重构内外均衡关系。而“嬗变中的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关系的嬗变”的理论命题,在于揭示这一内外均衡关系的演化。从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视角认知全球化。全球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全球性的经济、政治、人文精神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差异性特征的动态过程。它作为以工业化为基础和与现代化相伴而产生的全球性社会综合效应,存在着正负效应之分。如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向后工业社会的变迁是正效应的表现,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其负效应的表现。为此,笔者不赞同——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后全球化进程存在中断之说,而认为全球化自身存在两种性质的嬗变与效应,即演变与蜕变。^[4]前者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与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吻合的演进;而后者则表现为一种逆向的、背离人类基本价值取向的蜕化。这样的判断和认知表达着不同的价值关怀。而后文将要提到的“中国社会嬗变”,其立意在于前者而非后者。

其二,全球化是跨国主体及其活动超越国家主权和边界整合资源(广义的)乃至不同民族社区生活的方式与路径。这里的“跨国主体”及其社会行动,存在着五重区分:一是如联合国与“维和行动”、亚太经合组织等等;二是如跨国公司、全球人类基因协作组织、国际空间站等;三是在国际互联网中的网络行动个体;四是秩序化的全球性宗教与活动;五是非秩序化的行动主体与活动(战争、邪教)。由于跨国主体及其社会行动的存在,特别是全球信息化与网络化条件和环境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使非政府组织社会行动的社会性放大^[5],使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非主权意义的全球秩序的共同维护;另一方面,既使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跨越传统政治疆界,又使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民间力量和个人跨出传统主权疆界。因此,当全球化趋势造成权力多元化与权力社会化时,既改变了全球范围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结构,又改变了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结构模式。

其三,全球化是消解与强化全球传统区位结构差序关系的趋势与表现。当全球化使权力多元化和国际化时,传统区位结构差序关系的演化,表现出三种可能性:一是先发国家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进一步拉大

“中心”与“边缘”的时空差距;二是后发国家“发展的叠加性”^[6]张显,获得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机遇;三是全球区位结构的差序关系在较长时期内依然,即尔增长、吾也增长。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全球化是其“现代化”的背景与环境,现代化是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因。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现代化质量愈高,全球化所孕育的发展叠加性特征(权力)就愈显著;同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也随之扩大。正如“关贸总协定”组织放大为“世贸组织”时,中国政府为加入“世贸组织”也同时放大权力的社会化效应(中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中已经提出,凡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的法律法规规章都要修改,而国务院拟修改的外经贸法规规章共有148件,拟废止的共571件^[7]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可能消解全球传统区位结构差序关系的作用与影响,也会波及和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差序关系及结构。

二、全球化与中国本土化的关联

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是人类契合共性的进程。因而不同民族国家必然要借助全球化整合本土资源。这是后发国家在全球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的必然。所以,当中国面对全球化时,最大的机遇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最大的挑战也是如何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即全球化与本土化表达的是一种强制与反制的冲突和矛盾关系。

首先,从总体上判断,一个国家与全球化的关联度愈深,其传统的特质就相对愈弱,而现代性特征愈显著。由于“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8],因而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要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空间,其社会的嬗变在所难免。这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趋势,也是其增强自身现代性的必然需要。在现实中,由于这种趋势早被西方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所宣扬(即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全面溶解剂”),因而受到后发国家普遍性的批判(“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但可怕的不是西方在宣扬“西方中心论”,而是许多后发国家既成性的文化认同。因此正确的态度应是积极扬弃和修正。

现时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信息化过程产生信息化社会结果。^[9]而中国社会与之相契合的重要特征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0]这表明,现实中国社会的嬗变具有双重性,即实现工业化迎接信息化;推进市场化

面对全球化,并与嬗变中的全球性结构调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这一关联中,一方面中国社会变迁的本土性质及趋势已经形成,如“中国特色”话语的形成,以及由此扩张的现代性路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空间,将因为全球化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而引起中国社会关系及结构的全方位嬗变。

其次,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考察^[11]。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石的一种政治现象。它是西方价值观、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等强权政治意向和理论在全球扩张的一种社会政治效应的体现。西方发达国家居于全球经济结构的中心区位并主导全球化进程,使西方政治的全球效应进一步张显。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本质是通过特定制度文化的恪守,有步骤地整合“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机遇。由于制度文化的差异,中国社会嬗变的方式及战略选择,与西方利用全球化嬗变的战略意图之间,存在尖锐冲突是必然的。同时,中国政治的本土性质与全球化现代特征(和平是主题)的结合,既表现在全球政治关系中继续保持其“特色”的一级,以使全球政治关系具有多元的性质,又参与全球政治的多级结构竞合,以对单级的强权政治形成反制。

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强化了先发国家再度集中全球发展机遇的社会效应,并使“经济全球化”在“骨子里”继续保持其“奴役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把发展的本土需求同全球的现代主题——“发展”相整合,使其基本价值取向与社会经济运行原则具有本土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契合全球资源的路径选择中,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将因为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社会与全球化的关联度迅速提高,并使中国获得改变其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和全球经济原有结构关系的可能机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本土性特征与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性特征关联度的提高,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国家与各类经济主体、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把全球化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在理论上至少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整合与消解。正如,蕴藏着国家意志的跨国集团的企业文化对后发国家传统的机制文化、管理文化

和市民社会亚文化的冲击;如全球网络文化的多元和它超越国家传统疆界的功能与影响,已产生了一种值得人们深思的文化现象;当我们运用 Windows98/Windows2000 时,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我们在按美国人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解构着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其国情的特殊性和传统文化的深厚性,决定着中国本土文化在与全球文化的整合中,只能从本土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去整合全球化的现代性。其中,虽然冲突与排斥难免,但融合、同化与改造的机遇并存。正如我们在积极“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12]一样。当中国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发生整合时,其社会的关系文化、市民社会的人际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俗文化等等,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中国走进21世纪时,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13]的同时,“开放型社会”发育和形成的社会效应也将显现出来,从而使嬗变中的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嬗变的关联度进一步提高,使嬗变中的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嬗变的影响更广、更深远。

三、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关系及结构的嬗变

中国社会基本关系结构的原生性与本土特征的形成,是同制度要素、国情文化和传统理念与人文精神相联系的。因此,当20世纪乃至新中国50年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本土性质与趋势形成后^[14],其社会嬗变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整合,始终恪守着对西方理论的再造与同化的趣向。即毛泽东说的:“把学的东西中国化”^[15],邓小平说的:“走自己的路”。

在全球化嬗变中转型的中国社会,其社会关系及结构已经客观地发生着嬗变。如中国特色的非国家层面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发生和形成;如市场经济中政府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化引发的社会管理权力关系的变化;如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隶属关系与从属关系的变革;如社会转型中伴随着“单位人”、“社会人”而使政府社会治理成本向社会转移正成为一种趋势一样等等。只是当中国社会关系及结构的嬗变与现实全球化进程相契合时,并在中国社会加速与再加速发展内趋力的作用和这一态势的牵引下,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嬗变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更强、更大而已。这既是新中国50年社会进化过程始终具有“革命”^[16]性质和意义的必然,又是嬗变中的全球化“作俑”的结果。因此,20世纪末中国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空间所构建的内外均衡关系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契合的需要,并对中国社会关系及结构的嬗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笔者拟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进一步作如下分析——非国家层面的、有中国特色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的发生和形成。

提出中国“社会契约关系”理论命题,意指中国社会因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结构转型,已经发生和正在形成的、对所有累积性(国家关系除外)社会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总称。

中国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后的社会嬗变,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并非国家层面的,即国体和政体基本属性的变革。笔者不赞同部分学界同仁以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理论经典思想的“社会转型”话语,即指社会基本制度的变迁,来套解“中国社会转型”。笔者认为,在特定制度文化条件下发生和形成的中国社会契约关系,与“社会契约论”作为16世纪以来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都是有根本区别的。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关系的发生,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政治既成的法定关系。这是同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同30年新中国社会变迁中政治发展叠加性持续张显和非市场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也是同30年建设时期高度集中管理模式与社会组织、个人同国家关系的计划性安排相联系的,即这里存在着一个事前“约定”的问题。这里之所以称之为“约定”,在于国家法权实质上(归根结底)是人民授权,即人民把解决整体性事物和处理整体性社会基本关系的权力,事前让度于国家。但中国社会中的一般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从属于和隶属于国家政治关系的既成性约定,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基本关系中一种居主导的“事实关系”,即国家依据权力机关性质(统一的宏观管理权),对公共关系性质事物单方意定而成立的规范;同时,也使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时,获得了事前约定的权力。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关系及其结构中,不存在非国家层面的、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的一般契约关系,即不存在现实中国在市场经济与结构转型背景下正发生着的新型社会契约关系。

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整合中,中国社会基本关系及结构的嬗变,客观地在市民社会与社会经济运行层

面上,渐进地、但同时也是整体性地演化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契约关系。它的发生与形成,一方面并非偶然,而是内蕴着中国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客观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和社会力量推动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它包含着“法定”与“意定”两种类型的“约定”而具有中国特色。正如在现实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社会经济组织和一部分事业组织具有“四自”的权利和市场主体的地位,并迫使这些组织与国家作为最终所有者(社会约定的主体之一)之间构建出的新型社会契约关系——既具有法定的性质(国有资产增值和保值的约定),又具有意定的性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如现实社会中,涉及所有社会组织的“全员合同制”的推行,使个人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结成一种具有意定性质的新型社会契约关系,即所谓基于平等主体之间对私权利事务依意定自治而为的合意行为关系发生(限于篇幅,这里不探讨“享有权利”和“权利的实际享有”的关系,也不讨论所谓“双向选择”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再如民间力量参与国家发展而与政府、社会和个人构成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从而使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能够向社会偏移;如国家与农民之间关于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约定,以及如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个人与律师之间、个人与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患者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乃至政府组织内部实行的层级负责制和目标管理的达标约定等等。

与全球化嬗变相关联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一方面表明,国家作为社会基本关系重新约定的主体之一(资源掌控制者),已经主导和参与了非国家层面的、新型社会契约关系的构建;并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组织、国家与个人、社会组织与个人之间累积性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非国家层面的多级社会关系与结构中的一般契约关系,无时不在地发生于各种所谓平等社会主体之间(包括个人)。这既改变着社会组织与个人同国家之间传统的隶属关系,或者说国家赋予了(一种回归)社会组织与个人同国家构成非国家层面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的权力和主体地位,又改变了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非平等的依附关系,如“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传统依附关系向双向选择的权力关系转变;同时,还改变了各种民间力量(国内的和国外的)与国家力量实现社会整合的传统方式与途径。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由于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基本方法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

得出的确切结论”^[17]。因此,虽然现实社会中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一般社会契约关系构建的平等基础还需重新诠释与巩固,但是,“双向选择”所蕴藏的所谓平等主体地位与平等权力关系等,作为一般社会契约关系构建基础的社会效应,正在发生嬗变的中国社会迅速扩散着。而由此产生的影响或许是积极的。一是表现为非政治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发生,是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制度基元;二是基于政治权力的单向约定,被多元力量非政治的参与和修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三是自主、自治、平等、民主参与等权力要素的集合,正在成为现实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要件,并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由此,嬗变中的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嬗变(市场经济)的契合,使中国社会基本关系及结构,由既成性的政治约定、由社会组织对国家的从属关系、由个人对社会组织的依附关系等等,正逐步演化为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法定和意定相结合,演化为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平等主体之间以意定为主的社会契约关系。从总体上讲,这种积极的演化,将推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关系的变迁——走向可预见性、规范性和责任性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

在构建市场经济与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由国家主导和全社会参与而发生的非国家层面的一般社会契约关系,将因中国加入WTO建立“开放型经济”,进而形成开放型社会而意义重大和深远。这一历史进程,正意味着中国社会关系的传统性与全球现代性整合的力度进一步增强;意味着政府与组织与个人之间权利关系及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意味着中国累积性社会关系迅速发生改变和走向规范化与重新制度化;意味着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民主化与法制化水平再度提高。

参考文献:

[1] [德]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 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

想[J]. 政治与现代史,1997,(33/34).

- [2] 詹·罗西瑙. 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A].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C].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255;沈永林.“世界性‘全球化’大讨论”[A].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C].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234.
- [3] 郭道辉.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 法学研究,2001,(1): 3-17.
- [4] 辞海(缩影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338.
- [5] 康健. 全球背景下社会意义的放大[J]. 理论与改革, 2001,(1):8-13.
- [6] 戚攻.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叠加性[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3).
- [7] 新华社北京3月4日:中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首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
- [8] 费孝通. 我们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映[J]. 社会,2000,(7):4-6.
- [9] 戚攻. 虚拟社会与社会学[J]. 社会,2001,(2):33-35.
- [10]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00-10-20.
- [11] 戚攻.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 党政干部学刊, 2001,(1):23-26.
- [12] 周勇,邓新民. 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J]. 探索,1999,(3):6-9.
- [13]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00-10-20.
- [14] 吴怀连. 走向边缘、回归中国:21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J]. 探索,2001,(1):40-42.(注:笔者并不赞同“走向边缘”的立意,而是选择“回归中国”的思想.)
- [15] 毛泽东.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A].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51.
- [16] 笔者注:建国三十年始终注重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继续革命”,而“改革开放”是回归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正向作用的又“一场革命”;虽然两者都具有“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但作用力方向和事物发展路径的根本转变,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效应。
- [17] 恩格斯. 致爱德华·皮斯[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72. 420.

Globalization in Changing and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Relationship

QI Gong

(Chongq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Chongqing 400041)

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 is getting closer as China is now an active member in the world community, thus resulting in some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namely the “social indenture relationship”, is forming that will exert great impact on all the accumulative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a; social relationship; change